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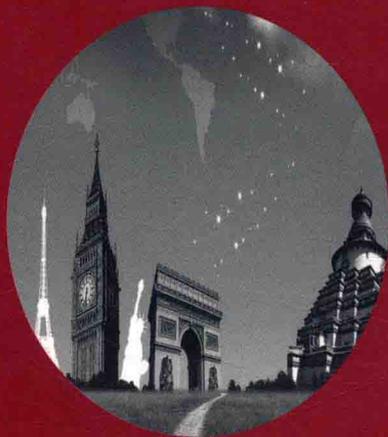
新世纪应用型高等教育基础类课程规划教材

(第二版)

中西文化概论

ZHONGXI WENHUA GAILUN

主 编 姜 平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应用型高等教育基础类课程规划教材

课程(910)自课程五并图

大, 害大 — 融 — 主平姜, 主编
(第二版)

中西文化概论

ZHONGXI WENHUA GAILUN

主 编 姜 平
副主编 黄小芄 王荣生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文化概论 / 姜平主编. — 2 版. — 大连 :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 8(2017. 7 重印)

新世纪应用型高等教育基础类课程规划教材

ISBN 978-7-5685-0512-3

I. ①中… II. ①姜… III. ①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6705 号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大连市软件园路 80 号 邮政编码:116023

发行:0411-84708842 邮购:0411-84708943 传真:0411-84701466

E-mail:dutp@dutp.cn URL:http://dutp.dlut.edu.cn

大连力佳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185mm×260mm 印张:24 字数:554 千字

印数:1501~3000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2 版

201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白璐

责任校对:王凌翀

封面设计:张莹

ISBN 978-7-5685-0512-3

定 价: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前 言

《中西文化概论》(第二版)是新世纪应用型高等教育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编的基础类课程规划教材之一。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都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费孝通先生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以激发我们学习中西文化的灵感。一方面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积极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这就是“取其精华”;另一方面,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在西方文化中,都存在着某些腐朽的东西,必须批判与摒弃,这就是“去其糟粕”。因此我们要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从而树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信念,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我们学习本教材的目的、要求和应采取的基本态度。

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家积贫积弱的历史现实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迈出了探究西方的第一步。然而这种探究是极其功利性和现实性的,其目的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寻求强国富民之道。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源头、发展、变化或知之甚少,或漠然视之。即使关注也仅仅是将注意力放在对西方现代文明影响巨大的思想和社会学著作的译介上。如严复就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因为这些著作与现实和社会紧紧相连。由此也就造成了中国学人对西方现当代文化非常关注,而对西方传统经典文化片面了解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学人们关注的主要领域也过多地集中在西方现代、后现代的诸多主义上,并延续至今。即我们习惯了从西方的现代思想文化中看西方,这势必造成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片面、不完整和断章取义。这就是本教材从西方文化的两大基本要素——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入手的根本原因。



而对于学习英语的中国大学生而言,在阅读英文报纸杂志、欣赏西方文化艺术以及与英语国家的人士进行交往时,往往由于缺乏基本的西方文化知识,而造成误读误解。因此有必要从西方文化的源头系统地、较为全面地向学生介绍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国大学生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了解似乎不应是个问题,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于什么是文化、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联系、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些本质性的问题,许多大学生并未深入地、全面地探究过,甚至对中国古代的哲学与宗教的一些常识性问题较为模糊或知之甚少。在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下,大学生如何肩负起中西文化沟通、交流的历史使命,这是需要我们共同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根本还在于我们应当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有起码的常识性的了解和认识。

总之,我们认为文化知识和文化修养有助于人的性情、趣味、价值标准的确定与提升。当今的大学教育既要“一切所学,皆为所用”,也应“一切所学,皆成性格”。编者均为从事教学工作的一线老师,愿意也努力为此目标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本教材适合作为英语、商务、旅游、对外汉语专业本专科学生的基础课教材,也适合作为其他专业通识教育选修课的教材。基于中国大学生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中国部分按专题编写;由于多数中国大学生对西方历史认识模糊,故西方文化部分按历史叙述法来编写。

《中西文化概论》初版教材出版已经6年了,四川教育学院也转制成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成都师范学院,我们很高兴本教材得到全国各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使用,现根据反馈的意见进行修订。我们修订了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第十一章第三节,同时修正了文字错误。

本教材由成都师范学院姜平任主编;成都师范学院黄小芄、王荣生任副主编;成都师范学院陈鸿金、彭小华,宁夏大学新华学院马丽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具体编写分工如下:姜平编写第一章的第四至第六节、第八章至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的第三至第六节、第十三章,黄小芄编写第一章的第一至第三节、第二章、第四章,王荣生编写第六章、第七章,陈鸿金编写第五章,彭小华编写第三章,马丽编写第十二章的第一至第二节。

编者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许多相关教材、文献资料,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尽管我们在教材的特色建设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但由于经验和水平有限,所以教材中仍有可能存在疏漏之处,恳请各相关教学单位和读者在使用过程中给予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以便我们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编者

2016年8月

所有意见和建议请发往:dutpbk@163.com

欢迎访问教材服务网站: <http://www.dutpbook.com>

联系电话:0411-84708445 84708462

第七章 古罗马文明	164
第一节 概 述	164
第二节 罗马法	170
第三节 古罗马科学、文学、艺术	172
第四节 基督教与《圣经》	180
第八章 中世纪基督教文明	192
第一节 概 述	192
第二节 中世纪宗教社会的兴起	196
第三节 中世纪西方文化特征	204
第四节 中世纪文明成就	206
第九章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217
第一节 文艺复兴的兴起	217
第二节 文艺复兴的发展	241
第三节 宗教改革的兴起	265
第四节 宗教改革的发展	268
第十章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潮	274
第一节 启蒙运动的兴起	274
第二节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	276
第三节 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	283
第四节 浪漫主义文学与艺术	290
第十一章 工业文明	298
第一节 工业革命	298
第二节 自由主义	299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	304
第四节 工业文明时期文学	309
第五节 工业文明时期艺术	314
第十二章 多元现当代文化	323
第一节 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	323
第二节 现代主义哲学	329
第三节 现代主义文学	332
第四节 现代主义艺术	336
第五节 网络文化	339
第六节 现代文化的特征	340
第十三章 西方语言文字与音乐	342
第一节 西方语言文字	342
第二节 西方音乐	349
参考文献	378

第一章

中国文化绪论

学习目标

了解什么是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中国历史梗概，重点在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的历史传说如有巢氏巢居、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结网、神农氏尝百草，都隐约反映了中国先民在其发展特定阶段的生活经历。黄河流域姜姓炎帝族、姬姓黄帝族共与九黎蚩尤族斗争的传说，还有黄河下游太昊氏与少昊氏的传说，反映了氏族社会时期部落之间的关系。至于尧、舜、禹的活动和禅让传说，是由血缘氏族部落进入地域氏族部落联盟历史的反映。

伏羲相传是人首蛇身，与其妹女娲成婚，生儿育女，成为人类始祖。又相传他是古代华夏部落的首领，还根据天地阴阳变化之理创造了八卦，即以八种形象简单而寓意深刻的符号来概括天地万事万物。此外，他还模仿蜘蛛结网而制成网罟，用于捕鱼打猎。伏羲人首蛇身，故有“龙的传人”之说。

神农氏是传说中的炎帝，教民耕种，相传还尝百草，创医学。

黄帝传说是中原各民族的共同始祖，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他率领各部落打败蚩尤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相传黄帝有许多创造和发明，如养蚕、舟车、文字、音律、算术、医学等。历史上尧、舜、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故称“轩辕后裔”“炎黄子孙”。从这些关于中华文明上古的神话和英雄传说中，我们可以初步体会什么是文化。

第一节 什么是文化

一、文与化

“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如《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

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而“文”至少有以下引申义，其一，指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如《尚书·序》所载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子罕》所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所以《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疏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而进，以进为文”，郑玄注“义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化”本义为改易、生成、变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周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求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归纳以上的含义，“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并由此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即教化。如《说文》：“化，教行也。”《周礼·大宗伯》：“以礼乐合天地之化。”《荀子·七法篇》：“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

“文”与“化”并称联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这段话的意思是，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十分明确。

西汉以后，“文”与“化”合成一词，如“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南朝齐文学家王融的《二月二日曲水诗序》），“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这里的“文化”与“自然”对举，或与“质朴”“野蛮”对举。

西方各民族语言中，亦有与“文化”对应的词汇，英语、法语是 culture，德语是 kultur，应该都源自拉丁文 cultura，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多重意义。英文、法文与拉丁语都属印欧语系，也用 culture 表示栽培、种植之意，并由此引申为对人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这就与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文治教化”内涵比较接近。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一开始就专注于精神领域，而 culture 却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生发，继而才引申到精神领域。

人创造发展文化，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这里的“自然”不仅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对立的外在自然界，也指人类的本能、人身体的各种自然属性。文化活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改造者”自身，即改造实践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文化的实质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这个主体通过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既反映在自然的面貌、形态、功能不断改变，又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工艺与道德、自律与律人）的不断提高和完善。简而言之，凡人类有意识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自然的人化”即文化。

二、广义与狭义的文化

文化这个概念有广狭义之分。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括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把文化定义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包括社会生产、制度、政治、思想教育、文学艺术,等等。这是广义的文化。文化结构有物质与精神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

与广义“文化”相对的是狭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称作“小文化”。汉语“文化”的本义是“以文教化”,亦属于“小文化”范围。

狭义的文化在逻辑上从属于广义的文化,与后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在研究人类的精神创造时,不能忽略物质创造活动的基础意义和决定作用;在讨论关于心态文化诸问题的时候,不能忽略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对于心态文化的影响、制约。无论广义或狭义,本书着重讨论传统中国文化中对现代中国文化影响较大较深或有助于更深刻、全面地了解现代中国文化的那些基本方面。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

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包括两个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如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变化速度缓慢,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人所觉察。人文地理环境,如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自然地理因素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这两方面也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离。但历史上的地理环境毕竟不同于现在的地理环境,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地理环境条件下,这才有助于了解今天的中国文化。

一、历史地理环境

世界古文明几乎都诞生于北半球温带大陆。北半球陆地面积大、相互毗连,由东向西出现过黄河—长江流域、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地中海和墨西哥诸文明,其中的中华文明位于北半球文明带的最东端。

《尚书·禹贡》早就对中华民族所栖息繁衍的东亚大陆作过这样的描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中国东部是浩瀚的太平洋,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构成了大陆东部的边缘海。从帕米尔高原的东南,由北支喀喇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和南支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包围形成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青藏高原,其平均

海拔在4 000米以上,冰山雪峰直插云汉,是中国西面最高的高原,也是世界屋脊。中国西部边疆远推至中亚地区。从帕米尔高原向东北,天山—阿尔泰山—萨彦岭—外兴安岭横亘在蒙古高原外围,成为中国西北和北方的一道天然长城。这两条由帕米尔高原分别向东南和东北方向延伸的巨大山系对地处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形成“入”字形的围护之势,构成封闭型骨架。而中国西南的中缅、中越边境同样山峦连绵,澜沧江、金沙江、乌江等大江大河沿着峻岭峡谷奔腾而下,这一带山高水险、热带丛林密布、瘴疠盛行、风雨水泛、地广人稀,古代这一地区的交通极为困难。

这种一面环海而三面与域外陆路交通困难造成了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虽阻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但保护了中国文化按其自身规律而独自发展。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首先造就了华夏中心主义的心理定式,以华夏为天下中心,雄视邻邦,称周围夷狄蛮戎。《皇朝文献通考》云:“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之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这种以我为尊,视栖身之地为天下中央的观念,主要原因在于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缺乏交流、疏于了解。其次,偏居一方的地理位置,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但疆土广袤,腹里纵深,回旋余地宽绰。这使中国文化形成了“保护反应机制”,表现出超常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曾与中国同处近似纬度地带的古老文明,如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相继中断,唯有中国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虽数次受到冲击,却表现出了对异质文化的巨大涵摄能力,最终将其融入。

夏朝(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统治了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经过商、周二代约十三个世纪演变,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公元前210年秦帝国的疆域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临大海。此后历代王朝疆域时有盈缩,但基本趋势是逐渐扩大巩固,不少王朝都拥有过今天中国领土以外的疆土。如从西汉中期至西晋末年的400多年间,朝鲜半岛东北部曾是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自西汉中期至明末的千余年间,今越南北部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唐朝和元朝北界都远达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唐朝的西界一度直抵中亚的咸海。

清朝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最终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土的基础,形成了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统一国家。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式微,帝国主义列强武力强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大片领土。

二、民族

历史上在中国范围内居住和活动的民族有十多个,除月氏族主体在公元前二世纪迁到中亚以外,其他各民族几乎都没有完全离开过中国。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朝鲜、俄罗斯、塔塔尔族等在过去一两个世纪中从境外迁入,其他民族多在中国形成,或在中国生活已有漫长的历史。不计汉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沙陀(突厥的一支)、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建立过统治中原的政权,其中蒙古族和满族还统治过整个中国。但无

论汉族还是汉族以外的民族建立政权,都包容其他民族,都是多民族的国家。

早在春秋时代,汉民族的前身华夏诸族就成了黄河流域的主体民族。之后汉族随着自身扩张、迁移和其他民族迁入,融合了其他民族,数量最多,经济文化保持着总体优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和核心。上面提到的那些曾统治中原的非汉民族,有的作为民族早已不存在,有的只剩下少量人口。但这些民族并没有从肉体上消失,而是融合于汉民族之中了。从东汉至南北朝活跃在中原的汉族以外的各民族,到唐朝都已被当作汉族的一员,如白居易、元稹、元结等诗人和唐朝许多文武大臣都属非汉族后裔。同样,汉族人口也曾大量迁入非汉族聚居区,融合于迁入的其他民族。

中国历史由各民族共同缔造,其领土也由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巩固。少数民族为开发和巩固边疆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如藏族及前身吐蕃在青藏高原,古代西域诸族和维吾尔族在新疆,蒙古族在内外蒙古,契丹、女真和满族在东北,高山族在台湾地区。真正的民族平等尽管不能在古代社会制度和不太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实现,民族歧视、压迫、冲突以至战争长期存在,但各民族间的交流、合作和融合是主流。特别是整个国家在面临外来侵略的紧要历史关头,各民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

三、人口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汉朝有近6000万人口,未列入统计的少数民族和其他人口估计还有数百万,合计超过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的1/3。十二世纪初的北宋末年,其境内的人口已经超过1亿,加上辽、西夏境内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就更多,而当时世界人口约有3.2亿,也占1/3以上。1850年世界总人口约12亿,而中国人口已突破4.3亿,所占比例并没有减少。

当然,在以往两三千年间,中国的人口并非直线上升,而是经历过若干次起落。每当巨大的天灾人祸持续发生时,人口损失幅度达20%以上,有时甚至超过50%。但即使在人口低谷,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一般也在1/5以上。古代历史上的生产主要靠人力和简单工具,中国过去无疑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生产力。

中国庞大的人口分布并不均衡。公元一世纪初,60%的人口分布在太行山、中条山以东,豫西山地、淮河以北,燕山山脉以南的地域内,其平均密度约每平方公里77人,而长江以南大多数地区人口稀少,尤其是今浙江南部、福建、两广、贵州等地,还有大片无人区。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一是首都长安及其近郊,每平方公里超过1000人,二是今山东菏泽、定陶、东明一带,每平方公里263人。以后随着经济发展,政治中心转移,人口迁移和自然条件变迁,人口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以淮河、秦岭、白龙江作为划分北、南方的界线,北方和南方所占人口的比例从公元初的7:3演变为公元十世纪末的4:6。十四世纪前期竟达到2:8。明清以来人口北南差有所缩小,大致稳定在4:6。十世纪以后,主要人口稠密区已转到南方,其中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和福建人口尤其稠密。十九世纪前期苏州府(大致相当于今苏州市)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但随着人口增加和开发地区扩大,地区间人口密度的差距有所缩

小。到二十世纪初,以云南腾冲—黑龙江瑷珲(今黑河)一线为界,中国形成了东南人口稠密和西北人口稀疏的格局,至今无明显改变。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十四世纪中叶以前,移民主流由北向南,即从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及更南地区,其中以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唐朝安史之乱后、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的三次南迁影响最大、移民人数最多。明朝初年,数百万人口从长江以南迁至江淮之间、淮河流域,或从长江中游迁至四川盆地,从山西迁至华北平原。此后直到二十世纪前期,移民的主流是从平原进入山区,从内地迁往边疆。随着沿海城市和工矿城市兴起,又有大量人口从农村和小城镇迁入城市。此外,历代统治者以行政或军事手段将人口集中在首都附近,向边疆或其他地区强制移民,敌对政权间的掠夺性移民,北方游牧民族、边疆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曾多次发生。来自中亚、阿拉伯甚至欧洲的移民也曾在中国定居,融合于中华民族。如十三世纪中亚、阿拉伯和波斯地区的各民族移民到中国,以他们为主并吸收其他民族而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回族。

中国人也不断移居海外,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从十五世纪以来就以东南亚为主要移居区。十九世纪中叶后向海外的移民规模日益扩大,移民及后裔的数量已达数千万。中国移民对所在国和中国本身在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四、政区

政区(行政区域)是为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区域,其划分以国家建立为前提。商和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从上到下“分土而治”,天子和各级诸侯的直接统治区都有限,自然不需要分级管理。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经过一系列兼并后剩下的诸侯国范围越来越大。同时,各诸侯国一般都将所灭之国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下,不再分封新国,国君直接统治的区域迅速扩大。因此,直接向国君负责的行政单位——县、郡应运而生。起初,县与郡没有上下之分,也没有主从关系。但到战国后期,随着县的普遍设置,郡成了县的上级政区。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六国,郡县制基本推行全国。

秦汉都实行郡县制,即由数十个以至百余个郡管辖数百个到一千多个县或县级单位。到了二世纪末的东汉末期,原来只起监察作用的州才成为最高一级政区,形成州—郡—县三级制。开始全国只设十几个州,但汉以后州的数量不断增加,到南北朝后期已达到数百个,一个州所管的郡县越来越少,三级制已无意义。

隋大业三年(607 年)合并撤销了一些州县,又将州改为郡,重新实行郡、县二级制。唐朝尽管改郡称州,只有 16 年时间又改州为郡,但基本上都是二级制。但中央直接管理众多的州(郡)级单位总有鞭长莫及之处。为了对地方实施监察,开元年间(713—741)全国设置了十五个道。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为了加强地方的抵抗实力,不得不普遍设置方镇,以节度使掌握方镇的军政大权。方镇(又称道)成了州以上的一级政区,形成方镇(道)—州—县三级制。

公元 977 年,宋太宗废止了方镇辖州的制度。但全国有三百多个州(府、州、军、监)

级单位,朝廷难以直接管辖,因而不久就由原来专管督征运送财赋的各路转运使兼管军民事务,形成路—州(府、军、监)—县三级制,全国先后设过十五路至二十四路,但为了防止地方权力过于集中造成割据,一个路的不同事务往往由不同的“监司”所管辖,不同监司的辖区又不尽相同,州一级还有不少事务直属于朝廷,所以是一种不完整的三级制。宋朝还将一些比较重要的州改称为府,以后府越来越普遍。金灭北宋后,实行的政区制度基本与北宋相同。

元朝的中央称为中书省,在进入中原初期将其派出机构——行中书省进驻各地,统管军民事务,以后成为最高级行政区划。元朝中期,除了行中书省的直辖区(又称腹里)外,全国设十一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省)。省以下一般有路(或府)、州(或县)二级,少数也有路、府、州、县四级。

明初洪武九年(1376年)废除行省制,原来的省改称布政使司,分别任命三位官员负责民政、司法监察和军务。1427年后,全国划分为两京(南、北直隶)和十二布政使司,俗称两京十三省或十五省。省以下废除了路,但设有若干分守道、分巡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以后,朝廷为了地方治安或边防,陆续向各地派驻总督或巡抚,成为最高的地方行政官。到明朝后期,全国有总督、巡抚辖区约三十个。

清初设十八省,以总督或巡抚为长官,以下只有府(或直隶州、直隶所)、县(散州、散所)二级。每省还分为若干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废除了府一级政区,州、所都改为县,又重划了道区,所以成了省—道—县三级制。国民党废除了道,企图实行省、县二级制,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剿共”时又在江西首先分区设行政督察专员,不久推行到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承了这一制度,称为专区,以后改称地区,作为省的派出机构,基本政区依然是省(直辖市、自治区)—县二级制。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的地区陆续改设为市,成为介于省与县之间的行政区划,出现了省—市—县三级制与省—县二级制并存的局面。

在少数民族或边疆地区,历代还设置过各种特殊的政区或机构,如汉、唐的都护府,元朝的宣政院辖地,清朝的将军、大臣辖区等。少数民族政权或边疆政权有的模仿中原王朝的政区制度,有的建立自己的行政区划。但游牧民族的政权一般仅划分部族、军事编制或游牧区。

五、经济基础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由西向东奔流入海,携带大量泥沙在中下游积淀成辽阔肥沃的大平原。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给长江中下游地区带来丰沛的降水。以长江黄河为主的大水系和肥沃的平原为农业文明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考古发掘证明,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已见谷类遗迹或稻谷遗迹。距今约4000至5000年的龙山文化遗址和屈家岭文化遗址,也出土有石锄、石镰等农具及粳稻等谷物,表明中华先民早在六七千年前,已逐渐告别狩猎和采集经济,步入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时代。

及至商周,农耕经济长足发展,特别是崛起于中国西部的周人是典型的农业部族。

周人尊为先祖的后稷被奉为农神。《诗经》的《豳风·七月》、《小雅·大田》、《大雅·生民》、《周颂·良耜》、《周颂·载芟》诸篇真实描写了周代农业生产活动。以农为本、以农立国是周人根深蒂固的经济和政治理念。

周代以降,历代王朝重农,且定为治国之道。以农立国的国策、农耕工具改进和耕作技术提高,大大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长江流域稻作经济普及,朝廷推行移民戍边屯田的政策,中国的农耕区不断拓展。近代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育以前,中国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农业型自然经济。农耕经济是古代中国立国的基础,也是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除农耕经济外,中国北方草原自古生活着游牧民族,从早期的匈奴族到后期的突厥族、蒙古族,都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强悍民族。农耕与游牧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全过程。北方气候周期性变冷变干,迫使游牧民族南下寻找新宜牧区。中国历史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至宋元、明末到清代,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地区有过3次大冲击。军事征伐和政治角逐伴随着文化的激烈碰撞,而农耕与游牧文化在碰撞中相互交流、互补和融合。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既有血与火的战争,又有温情互利的“和亲”、互市、迁徙、通婚等活动,促进了境内不同类型文化的融合,从而逐步形成了以农耕文化为主、兼容并包、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

第三节 中国古代历史概述

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休养生息和发展的历史。中国发达的封建社会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帝国主义列强1840年用枪炮敲开中国的大门后,中国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从此中国传统文化面临首先需要近代化,进而需要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任务。

一、远古(约前3000—前2100):原始人群和氏族制社会

1. 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群

中国大地除个别省区外都有分属于考古学上称为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的文化遗迹出土,共计二百余处。

中国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发现于云南元谋,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早期最重要的人类化石是北京人。北京人生活在七十至二十万年以前,处于猿人阶段,能直立行走,有语言功能,脑量接近现代人。他们群体穴居,使用粗糙的石器,过着采集和狩猎生活,知道用火并能保存火种。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重要人类化石,有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等。丁村人发现于山西襄汾,处于古人阶段,距今十余万年,其体质已接近现代人,使用的工具远比猿人进步。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出土更多,主要有柳江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距今约数万年至万余年,处于新人阶段,体质形态的原始性已基本消失。他们能使用骨针缝制